



Simone de Beauvoir



第三卷·时势的力量·下

西蒙·波娃回忆录



Simone de Beauvoir

西蒙·波娃回忆录
第三卷·下

时势的力量

陈际阳
陈欣章
谭·健
译

校译：陈际阳 谭 健

(苏)新登字007号

时势的力量——西蒙·波娃回忆录(三)

译者：陈际阳 陈欣章 谭 健

校 译：陈际阳 谭 健

责任编辑：田迎春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江苏新华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27.5 插页 8

199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92年7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字数：687,000 印数：3,000—10,065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343-0/I·326

定 价：17.00元 （全两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 六 章

年轻的女子们对在她们成年后，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都有着敏锐的感觉。她们总是说：“我真不懂，一个女人过了四十，怎么还染发，怎么还穿着比基尼展示自己，怎么还同男人们调情卖俏。等我到了那个年纪……”可一旦真的到了那一天，她们照样也染发，照样也穿比基尼，照样也对男人们频送秋波。三十岁时，我也曾下过同类的决心：“四十岁以后，人就不该再去追求什么爱情了。”我厌恶那些被我称为“丑婆”的女子。我向自己保证，到那个阶段，我会理所当然地“安分守己”。尽管这样，我在三十九岁时照样搞了一次恋爱。如今，我已过四十岁了，已被划到日薄西山的那一类人中了，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尽管我的肉体对这种划分毫无异议，我的想象却不那么驯顺。当又有机会使我回到生活中时，我欣喜地抓住它不放。

六月将尽。我打算驾车去米兰。萨特乘火车去，在那儿同我会合。我们两人计划在意大利作两个月的旅行。同时，博斯特和科正兴高采烈地准备飞往巴西，出版商纳格尔派他们收集素材，以便写一本旅行指南。他们买好了白色的餐服，随后，博斯特邀请我们吃蒜泥蛋黄酱，为他们送行。我建议他们也把克劳德·朗兹曼请来。晚会到很晚才散，我们喝了不少。第二天早上，我的电话铃响起。是朗兹曼在说话：“我想

带你去看电影。”“看电影？什么片子？”“噢，随便哪个片子都行。”我犹豫了片刻。我最后几天的日程很满，但我知道我不能拒绝。于是，我们约好碰头的地点和时间。真使我大吃一惊，我一挂上电话，眼泪就夺眶而出。

五天以后，我离开了巴黎。当我起动车子时，朗兹曼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告别。某种事情已经发生；我毫不怀疑，某种事情也正在开始发生。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肉体。我沉浸在一片分离的柔情之中，竟在郊外迷了路。最后，我终于出现在第七国道上，高兴地看到前面是一条绵绵不绝的道路，我在此期间满可以回忆、做梦。

两天以后，我离开在那儿过了一夜的多莫多索拉，但人还在梦中。我的车上有一名游客，那是两位英国姑娘，要搭车从加来到威尼斯，她们的口袋里装着从慕尼黑到伦敦的飞机票。马焦雷湖上雨丝不绝。我猛踩刹车，竟把一块里程碑连根撞起。两个姑娘都大惊失色。几位意大利男子替我敲直了挡泥板，告诉我，这段路以弯曲出名，早就出过不计其数的车祸，这席话恢复了我的自信心。但是，这一惊还是没有使我恢复正常的感觉，倒使我头脑更混乱了。在一个岔道口，我让那两个英国姑娘下车，接着继续驶向米兰。我慢吞吞地开着车，一路寻找修车铺。突然，我发现右车门没关上，正啪啪作响。就在我关车门的当口，车子冲上了路旁镶边石。“我真昏了头，”我一边停车一边自言自语。这时，我猛地发现，我的包已从我身边的位置上不翼而飞。包里有我的全部证件，还有不少钱。我把车扔在路边，往回狂奔。不一会儿，一位骑车者朝我驰来，他伸直一只臂膀托着我的包，一边用厌恶的目光打量着我的脸。

我终于把汽车交给了一名修车匠，随后来到德拉斯卡拉咖啡店与萨特会面，同时也唤回了我的意识。但是，这天下

午，当我重又坐到方向盘前时，我又在忐忑不安。这种新的旅行方式对他有吸引力吗？我怕由于我的车技笨拙，他会永远失去对这种旅游的兴趣。不过，事实不是这样。虽然我的车在城里开得很糟，但他一点也没有烦躁。在开阔的大道上，他一般还是那样冷漠，不过，当遇到一些粗俗的意大利人穿过公路在我面前游荡时，萨特会叫：“超过他，超过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意大利人往往加快步子，有的甚至曲曲折折地跑起来，但就是挡在车前不让路。只要我没有最终超过他们，萨特就吵个没完。要是我对他的这些叫嚷言听计从的话，我们早就被杀死一百多次了；不过，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热情，而他那谨慎的警告则不讨我喜欢。

从克雷莫纳到塔兰托，从巴里到埃里切，我们再次认识了意大利：曼图亚城和曼特尼亚^①的壁画，弗拉拉城的绘画，拉文纳城，乌尔比诺城和乌切洛的作品，阿斯科里广场，阿布鲁齐的教堂，马特拉^②的穴居人，阿普利亚的trulli^③，莱切以及西西里岛上诺托的美丽的巴洛克建筑。我们最后抵达阿格里琴托，我们重游塞琴斯特、锡拉丘兹。我们穿过阿布鲁齐。我乘坐滑雪运送机，登上大萨索山之巅，看到了曾关押过墨索里尼的那座灰色的旅馆。有了汽车，我们不再受时间表的支配了，我们也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不过，萨特说，我们也有所失。我们不再能吃惊地发现自己突然降临到某一个城市的中心了。这一点我也同意。假如你坐火车，乘飞机旅行，一个城市宛如一个新世界。假如你驾驶汽车旅行，城

① 曼特尼亚(Mantegna 约1431~1506)：十五世纪意大利北部典型的文艺复兴艺术家，有多方面的才能。

② 马特拉(Matera)：意大利南部城市，居民从史前时代起就住在岩壁上凿出的窑洞中。

③ trulli：意大利语，一种干砌的圆形石建筑，有圆锥形屋顶。

市即是你一段旅程的终点，即是连接下一个城市的纽带，它不再是一片独立的天地了。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街道只是在向城外延伸，把你引向别的道路。城市也不再别具一格了，因为它墙壁的色彩，它广场和房屋的设计，早就出现在附近的小镇上了。这样的好处是，城市虽然不那么激动人心了，但是，能更容易为人所理解。我们只是在看到意大利南部到底贫穷到哪种地步之后，才认识了那不勒斯的真实意义。我们进一步熟悉了农村。我们在许多村庄停车，同意大利劳工们混杂在一起。他们一连几小时地坐在咖啡店里，什么也不喝，满脸绝望之情。常有人站在路旁做出吓人的手势；我们就停下车来，让他们搭车。在搭车的人中，大多数是失业者。他们问我们能不能替他们在法国找到工作。

除此之外，驾车旅行使我们遇到了一些意外。我还记得八月十五日的事情。早上，我们离开罗马，直奔福贾。整整一天，我们都是烈日下行驶，不时还遇上路障以及做长跑训练的队伍。夜幕降临了。在以后的两小时中，意大利人那耀眼的车灯刺得我什么都看不清，我真累垮了。我们在卢切拉停了车，想去找点喝的。我把车对着城墙停下，随后便穿过一扇扇大门寻找。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宽敞的大厅中，灯光似水，到处是跳舞的人，而大厅的天花板就是天空。走出这个大厅又是一个大厅。原来全是城市的广场，它们一个连着一个，处处亮如白昼，每一个广场上都有自己的乐队和舞厅。

这年夏天，意大利全国的温度计指数几乎无一例外始终在华氏八十度以上。萨特正在撰写《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续篇。他想写作，而我想观光。最后，我们设法两者兼顾，不过，这使我们相当不便。我们常冒着酷暑，或开车、或步行，游览，散步，漫游，一英里一英里地往前走，直到后半晌才

罢。随后，我们精疲力竭地回到房间，可房间里也热得喘不过气来。但我们不是躺下来休息，而是逼自己走到书桌旁。我常常一次又一次地把满是汗渍的脸泡在凉水中。

在归途中，我在米兰与妹妹呆了两天。在那几天中，我读了帕韦泽的日记，后来又把它带回巴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现代》杂志上刊登它的节选了。

在我度假期间，朗兹曼去以色列跑了一趟。我们互相通信。我回巴黎两周以后，他也回到了巴黎。我们的肉体又一次愉快地重逢了。我们开始互相倾诉往事以便建立共同的未来。为给自己下一个定义，他劈头一句话就是：我是犹太人。我懂得这句话的分量，不过，我的犹太人朋友中没有一个人曾使我完全懂得它的含义。他们总是对自己的犹太人身分不置一词——至少在同我交往中是这样。但是，朗兹曼坚持要我认识这一点，因为这是他生命中压倒一切的力量。

在孩提时代，他一开始有着一股自豪劲。他父亲常摊开世界地图，告诉他说：“我们无所不在。”当他活到十三岁时，他看到了反犹太主义，整个世界为此动摇，万事万物无不受到影响。他还是承认：“我是犹太人。”但这么一回答，对话戛然而止，问话者成了一个又盲又聋的凶猛动物。他感到自己要为这种变化负责。与此同时，由于他已沦落为一个抽象的名称——犹太人，他感到已失去了自己的存在。到最后，他甚至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他再也不知道到底是说自己是犹太人还是不说自己是犹太人才算撒谎。因为他的特殊出身，他被世人所厌弃，而在他这个年纪，是多么喜欢与他人一致啊。这种孤立状态给他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他的父亲是最早一批抵抗战士中的一员，是他使朗兹曼恢复了自豪感。在他还是克莱芒费朗公立学校的学生时，他就成立了一个抵抗组织。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以后，他就在一个游击队营地中战斗。这

样，他的经历显示了犹太人并非顺从苟生、低人一等、受人迫害之辈，他们可以成为斗士。被纳粹消灭的六百万男女老少所归属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不是先天注定的牺牲品，而只是一桩肮脏暴行的受害者。在夜间，他常常想起那些大屠杀，气得直淌眼泪。他发誓憎恨那些杀人凶手及其同谋，这憎恨使他重又回到一种孤立状态。不过，在过去，是外在因素把孤立状态强加在他周围；现在，他回到这种状态是因为希望得到一种自由意志！他想成为一个犹太人。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名字总使他内心充满自豪。随便什么时候，一旦他发现某位知名人士是犹太人时，他总眉开眼笑。即使现在，当人们在赞扬杰出的苏联物理学家朗道^①时不提及他是犹太人，他也会气得七窍生烟。

尽管在异教徒中有许多朋友，他依然对他们满腹怨恨。他对我说：“我想杀人，无时无刻不想杀人。”我能够感觉到，一种狂烈的情绪深埋在他的内心里，铭刻在他的骨子中，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有的早上，他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向我吼叫：“你们统统是混蛋！”他以滑稽的心情、疯狂的行为以及过分的言辞和姿态攻击我们的世界。二十岁时，还是大路易公立中学的高年级学生的他租了一套教士服，挨门挨户地叩响富户的房门募钱。但是，这种反感情绪只是一桩暂时之举。他依然留恋孩提时代，怀念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世人皆兄弟的岁月。可是，现实已把他撕得四分五裂，世界已陷入一片混乱；他想把自己重新拼起来，他也想找回世界的秩序。二十岁时，他曾相信文化的世界性。他勤勉地钻研，以便使世界性的文化也成为他的文化，因为他感到它还不完全属于自己。

^① 朗道Landau (1908~1968)：理论物理学家，一九六二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寄希望于真理所具有的调解力；但是，人们还是带着情绪，带着功利对待他，他们还是四分五裂。无论是知识还是理性都不能帮助他避免孤独。他只能无可奈何地陷入孤独状态，体验由偶然的出身带来的种种感受，到最后，他竟变得厌恶一切。他知道，凭内心取巧，他不能得到解脱；他唯一的拯救之道是，相信某种客观的必然性，以便使自己继续活下来。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至少同他自身的存在一样，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告诉他，人类的冲突是可以理解的，它使他从主观性中跳了出来。他和共产党人在观念方面相互合拍，也从共产党人的目标中看到了自己的梦想，于是，他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充分相信共产党。有时，他的这种乐观主义令我厌恶，但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的逆转罢了，因为他需要有一个颠倒一切的远景来补偿他往昔遭受的种种苦难。他这么一个思想敏锐，甚至可以说思想成熟的人却抱着善恶对立说不放，真令我大为诧异。他常为此责备自己，但是，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抓住这个观念。由于他已被掠走了一切，他不堪再被剥夺什么东西了。这样，他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对手看作绝对恶的象征。人们如果要重建失去的天堂，他们必须毫无瑕疵。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他不愿去想这个念头。在赞同——哪怕是无条件的赞同——和介入之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他绝对不能跨越这段距离，因为在他眼中，没有什么完全是真实的，尤其是，他本人就不完全真实。在他孩提时代，世界迫使他要么否定“犹太性”，要么否定自己的个性，因此，他的“自我”已经被世界窃走了：当他说“我”时，他显得如一名冒充“自我”的骗子。

他没有任何参照系，因此总轻易地因循受他尊敬的人们的观点。但是，他也固执、任性。他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摆脱情绪和欲望的支配，无法抑制自己狂烈的想象。他也不愿这

样做。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禁忌和规矩置之不理，悲伤时听凭自己流泪宣泄，反感时听凭自己口出恶言。我、萨特以及我们的好多朋友都是清教徒；我们总压抑自己的感情，务使自己的举止不出格，感情很少外露。朗兹曼这样率意而行，我感到不很习惯。不过，正是在他情绪发作时，他才显得与我更近。当初，我同他一样，往往凭着一股狂热制定计划，随后如痴如狂地坚持不懈。我往往也号啕大哭。如今，在我心底依旧埋藏着对往日狂热的留恋之情。

作为一名犹太人，也作为一个长子，他从孩提时代起就肯肩负种种责任。这使他在内心达到了可贵的成熟。有时乍一看，他似乎已经因袭了祖传的全部经验：我同他讲话时，总是忘记他比我年轻。但我们明白，两人相差十七岁。不过，这个差距并没有使我们着慌。对我来说，如果要真正奉献自己的心，我需要某种距离，因为我不想去重复我与萨特间具有的那种理解。阿尔格雷属于另一个大陆，朗兹曼属于另一代。同时，这种差异也使我们的关系维持了平衡。他年轻，因此，我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注定占他生命的一个短暂的部分。在我看来，这也为我提供了一个借口，我可以不必在现在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无论如何，他也没要求我这么做：他接受我的一切，既接受我的过去，也接受我的现状。不过，一开始我们并没有马上取得和谐。十二月间，我们在荷兰过了两天。我们沿着封冻的运河漫步，我们坐在窗帘紧闭的小酒馆喝阿德沃卡特酒，我们不停地交谈。我每年都要与特萨共度的假期使我左右为难：我不想放弃那假期，但是，如果同朗兹曼一别就是两个月，那又会使我俩很痛苦。最后，我们商定，朗兹曼每年夏天同我和萨特过十来天。谈着谈着，我们之间最后几分拘束、最后几分疑虑也消散了。等到回巴黎，我们已经讲定在一起生活。过去，我曾喜欢过孤独生活，但是，我毫不为此遗憾。

在共同生活中，我们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早上，我们肩并肩地写作。他从以色列带回一些旅行笔记，想把它们写成一部游记。在旅行期间，所见所闻深深地打动了。他看到，在以色列，犹太人并非局外人，他们是拥有一切权利的民族。他带着自豪，也带着某种反感发现，那里有犹太人的船只、犹太人的海军、犹太人的城市、犹太人的田野以及犹太人的树林，但是，那里也有贫富分化。惊愕之余，他给自己提出了有关他自己的几个问题。他也给萨特讲述了自己的观感。萨特劝他写一本书，把以色列的情况与他自己的身世融为一体。朗兹曼觉得这个主意很有吸引力。可是，真正写起来，情况却不能令人满意。他才二十五岁，缺乏写他自己所必需的洞察力。虽然他的头开得很好，但他马上碰上了来自他自己内心的绊脚石，最后被迫搁笔了。

由于朗兹曼与我一起生活，我也摆脱了自己年龄的困扰。首先，我打退了焦虑的冲击。有两三次，他目睹我正经受这种冲击，分外着慌。鉴于此，我痛下决心不向焦虑低头，因为我觉得，这么早就使他体验衰老带来的恐怖，那太可恶了。其次，有他在，我复苏了对万事万物的兴趣。在此之前，我的好奇心早就收敛了。我正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又被可怕而又简单的灾难折磨的地球上；我自身也是有限的存在，我的处境、我的命运、我的工作都是有限的，这限制了我的欲望。在我过去的岁月，我曾期待一切从我生活的每一个侧面出现！现在，虽然我还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虽然我还是注意新出版的书，新上映的电影，新展出的绘画，新开演的戏，但是，我更关心的是如何支配、深化、完善早年的体验。对朗兹曼来说，眼前的一切都是新的，这样，他往往使我得到了意外的启示。正是由于他，数不胜数的东西——喜悦、惊愕、忧虑、开怀大笑、世界的新鲜——回到了我身边。就在

前两年，世界形势暗淡，我正巧也遭到了恋爱的挫折，同时又得到了身体在衰弱的第一次警告。如今，我跳回到了幸福的天地中。战争也在退却，我沉浸在个人生活的欢乐中。

我还像过去一样经常去看萨特，但是，我们的习惯改变了。几个月前的一天晚上，我被一个异乎寻常的响动吵醒：好像有人在轻轻地擂鼓。我拉亮电灯。原来，水珠正从天花板上滴下来，敲击着一张皮椅。我向门房抱怨了几声，门房通知了房产经理人，房产经理人告诉了房主。但是，我屋里还是不时下雨。雨水慢慢使什么都发了霉。当朗兹曼开始同我住在一起时，家具里、地板上到处摊着书。虽然我们还可以在屋里写作、睡觉，但是，在里面生活毕竟不舒服。从那时以后，我把同萨特一起吃饭、喝酒、聊天的地点搬到蒙巴纳斯大道上的“帕勒特”；有时，我们也去“法尔斯塔夫”，这家饭馆使我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我们通常还同朗兹曼或奥尔加去“波谢里埃”，它坐落在广场的另一头。当我安排与别人见面的时候，我也常把约会的地点放在那里。那儿还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会聚之处。透过落地吊窗，你可以望见巴黎圣母院和暖房；留声机里，轻柔地放着勃兰登堡协奏曲。新年前夜，我们一群人——我、萨特、奥尔加、博斯特、旺达、米雪尔、朗兹曼——聚在波谢里埃路，萨特同我一样特别高兴。我们几个人之间是那样心心相印，不须动口，一个微笑即能表达千言万语。在这样的小群体中，交谈更成了世上最惬意的消遣。相反，一旦缺乏我们所达到的默契，交谈则成了一桩困难的、常常是无益的苦差事。这时，我已经对乍合即离的会面失去了兴趣。莫尼凯·朗依提出要带我去同福克纳共进晚餐，我回绝了。一天夜里，萨特在米雪尔家与毕加索和卓别林（我在美国见过他）一道吃晚饭。我没去，我宁愿与朗兹曼看《聚光灯》。

春回大地，伴随而来的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好消息：《第二性》在美国出版并获得成功，没有人发表什么下流的评论。这本书在我心目中总是那么可爱。每一次它要在另一个国家出版，我总高兴地得知，现实再次证实了它当初在法国引起的反感是读者的错而不是我的错。

三月末，我和朗兹曼去圣特洛佩兹。他带我去参观他当年战斗的游击队基地，在拉马格里德的几条路上，至今还垒着挡道的碎砖烂瓦。我在“艾欧利”同萨特会合；米雪尔在附近的一个街区与孩子们住在一起，当我们在塞内克埃露天座上与萨特在一起时，我们与梅隆·庞蒂及布拉瑟重逢。布拉瑟在加桑有一幢房子。他请萨特为他改编大仲马的《金恩》。萨特对情节剧总是爱不释手，因而没有拒绝。晚上，我们常坐在“艾欧利”的起居室里，围着一盆炭火。真没想到，就在不久之后，这家整洁的小旅馆竟然四壁萧瑟，满地灰尘了。原来，那位长着满头白发，身穿高领套衫，打扮精心，外表高贵的克洛夫人被指控为一起勒索案的同谋。一九五四年，当她的照片在各家报纸上登载时，我真难以认出那位面容憔悴的老妇就是她。我带着朗兹曼去游览莱莫雷、埃斯泰雷尔、海滨和悬崖盘旋公路。我们一边驾车，一边谈论我的小说。在此之前，我已经让他读了小说的手稿。他有着一种百般挑剔、煞费苦心的批判意识。他给我提了几条很好的建议以及几点使我受益匪浅的批评意见。一开始，他的批评真让我受不了，但我随后渐渐地意识到这些意见绝非空穴来风。当时，我正为这本书大伤脑筋。从我们去挪威旅游开始，我就已经从头至尾地重写了这本书，因为萨特在一九五二年夏末重读这本书手稿时还对它不满意。由于我厌烦小说的种种规矩，因此，我虽然接受了它们，但在写作时还是对它们半心半意。这样，书这儿太长，那里太短，结构支离破碎；对话听起来也不像是

真的。我想写几个特定的个人，他们有着自己的确信和疑惑，不停地受到他人和自己两方面的挑战，在目光敏锐和过于直率之间，在偏见和诚心之间，来回摇摆。可现在，我突然发现，我不是在塑造人物，而是在阐明什么思想。也许，确实不可能以作家为小说的主人公；或者说，我不可能这么做。我恐怕是才疏学浅……我下定决心：“把这统统搁置一边。”萨特则劝我：“继续写下去。”但是，他的鼓励不如他的不安对我产生的触动大。最后，还是博斯特和朗兹曼真正使我相信应该继续写下去。他们都是头一回读它，因此，更多地看到了它的优点而不是它的不足。于是，我重振旗鼓。但是，在这艰苦的最后一年，人们一次又一次吃惊地打听：“她不再写什么了？她怎么不再写了？好长时间来她什么也没有写……”在这些场合下，我不能不焦虑万分。一些笔头比我快的精干作家这时又拿出了新的小说，每当我看到这些小说的油墨未干的封面时，妒忌使我心头阵阵作痛。

早在十一月份，萨特就已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二部分。在文中，萨特明确地阐述了他是为了什么、是在多大程度上同共产党保持一致的。以后，他去了维也纳。他回来后，给我们详细地讲述了争取和平诸党派大会的情况。他与俄国人在一道整整呆了一夜，他们在一起喝“伏特加”。相对来说，共产党人来得很少，只占与会者的百分之二十。参加会议的许多代表没有得到本国政府的允许；有些代表为了离开日本和印度支那，不得不以双脚长途跋涉；其他一些代表（特别是埃塞俄比亚代表）冒着一回去即进监狱的风险。法国除了共产党代表以外，其他代表很少。萨特本来希望说服知识分子同他站在一起，但他们根本不见踪影。不久，在伊夫赛车场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由